

中華文史論叢

一九八三年第二輯

33.2

所

中華文史論叢

一九八三年第二輯

(总第二十六輯)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中华文史论丛

一九八三年第二辑

(总第二十六辑)

朱东润 李俊民 罗竹风 主编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中华印刷厂印刷

1983 年 6 月第 1 版 198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沪刊第 046 号 定价: 1.00 元

目 次

陈子龙及其时代(选载)	朱东润 (1)
桃花石和回纥国	章 巽 (39)
韩非主秦统一而无法存韩辨	蔡尚思 (51)
略论唐代的资课	李春润 (55)
宋代东南诸路盐产考析	郭正忠 (77)
《文心雕龙·风骨》笺释	王运熙 (117)
《文心雕龙》篇次原貌考	陈书良 (131)
汤显祖和晚明文艺思潮	徐朔方 (139)
汤显祖对张居正之认识及其在剧作中 之曲折的反映	蒋星煜 (155)
从梦幻意识看汤显祖的“二梦”	郭纪金 (173)
《牡丹亭》作年质疑	郑 闰 (201)
汤显祖在遂昌	王馨一 (211)
蔡琰生年考证补苴	陈祖美 (219)
萧颖士事迹考	俞纪东 (231)
李白三入长安考	李从军 (245)

吴梅村《秣陵春》传奇与《琵琶行》·····	王 勉 (259)
金圣叹的生平、人生态度和文学观·····	何满子 (273)
南海康有为先生著作总目 ·····	罗荣邦 (297)

《室名别号索引》明人部分正误

·····	杨同甫 (54、76、116、138、172、200、210、321)
“战人”与“择人”·····	刘 彰 (218)
左诂补正·····	陆澹安 遗稿 (244、272、296、320)

CONTENTS

Chen Zi-long and His Times (extracts)	
.....Zhu Dong-run (1)	
Taohuashi and the State of Huihe	Zhang Xun (39)
Han Fei's Idea of Achieving National Unification by the Qin Kingdom and That of Lacking Means for the Han Kingdom to Survive.....	Cai Shang-si (51)
The Revenue System of Zike (Tax in lieu of Corvee) in the Tang Dynasty.....	Li Chun-run (55)
Analysis of Salt Production in the Southeast During the Song Dynasty.....	Guo Zheng-zhong (77)
Annotations on <i>Wen Xin Diao Long</i> — <i>Feng Gu</i>	Wang Yun-xi (117)
Research on the Original Order of the Pieces in <i>Wen Xin Diao Long</i>	Chen Shu-liang (131)
Tang Xian-zu and the Trend of Thought in Art and Literature in the Late Ming Dynasty	Xu Shuo-fang (139)
Tang Xian-zu's Understanding of Zhang Ju-zheng and the Indirect Reflection of That in His Dramas	Jiang Xing-yu (155)

Viewing Tang Xian-zu's Two Dramas from the Angle of Dreamy Consciousness.....	Guo Ji-jin (173)
Doubts about the Date of Authorship of the Drama <i>Mudan Ting (Peony Kiosk)</i>	Zheng Run (201)
Tang Xian-zu at Suichang	Wang Xin-yi (211)
A Supplementary Research on the Date of Birth of Cai Yan.....	Chen Zu-mei (219)
A Research on the Deeds of Xiao Ying-shi... Yu Ji-dong	(231)
Studies on Li Bai's Three Sojourns to Chang'an	Li Cong-jun (245)
Wu Mei-cun's Poetic Drama <i>Moling Chun</i> and <i>Pipa Xing</i>	Wang Mian (259)
A Critical Biography of Jin Sheng-tan	He Man-zi (273)
The General Catalogue of the Works by Kang You- wei.....	Luo Rong-bang (297)

陈子龙及其时代*(选载)

朱东润

绍兴府推官

从崇祯十三年(1640)秋后到十七年(1644)之初,这不足四年的时间里子龙在绍兴推官任内。关于这段时间,子龙留下了比较详细的记载,同时他的晚辈王沄也留下一篇《越游记》,因此我们对于这时期内他的生活,可以了解得更多一些。

子龙的官职是绍兴府推官。绍兴府治在现在的绍兴市,推官是司法官,是绍兴府专管审判、检察的官,可是因为职务的关系,他还得经常到杭州去。杭州是浙江的省会,除了一般官吏以外,还有专管盐务的内监崔璘。地方官吏到杭州的都得到他那里进见,事实上他的地位是在巡抚、或是巡按御史之上的。思宗时代内监的地位,经过几次的升降。思宗接位的时候,由于他了解到太监魏忠贤的作威作福,曾经把驻在京外的内监全部撤除,这是深得人心的,但是不久以后,他感到京城内外的大小官吏不尽可靠,不能把京外的内监全部撤除,在他的思想意识中,不断跃出这样的呼声,官吏都得为自己的子孙考虑,为了要挣下一份可观的遗产,贪赃枉法,在所不免,可是内监们是用不到为子孙考虑的,因此不可能贪赃枉法,而且随时可以调京考察,这就成为比较可靠的客观条件。

* 这是作者所写陈子龙长篇传记,共十三章,现选载其中第六、十三两章。全书将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思宗一朝，内监的地位，经过几次的大起大落，但是还是以重用的时期为多。由于内监们对于皇帝可以经常见面，直接进言，因此他们在当时的内外行政机构中，树立了一种坚定的威信。当然，这只是一种错误的判断，不一定可以信赖，可是形象一经完成，必然会在大小官员中产生作用。

在杭州城内，崔璘竟成为州县官膜拜的对象。进见的时候，他们都得献礼、下跪，有的甚至转而请求崔璘的推荐。那时的词汇，称内监为内相，就是说他们在宫中的地位是当时的丞相。这也不完全违反事实，魏忠贤当权的时候，魏藻德不曾仰承他的鼻息吗？那是说，内监的地位，有时竟会远远超过当时的大学士。

可是尽管子龙经常因公到杭州，他从不去谒见崔璘。有人对他说：“还是去一下好，我们真为你担心！”

子龙只说：“要是去给内监屈膝，那倒不如回家好，多少还有一些活路。”他始终没有去，崔璘不久也离开了杭州。

推官只是一名佐贰官，随时可以由长官另行派遣的。不久诸暨县的知县官出缺了，布政司指名要子龙去署理。诸暨县在山区，接连遭到五年的水灾，因此人民的生活困难，打家劫舍的事也就层出不穷。子龙知道当地的土豪，有许多犯了罪正蹲在监狱里。他把他们找出来，提醒他们自己所犯的赃罪，要他们检举盗贼，立功赎罪。在这里他举行保甲法，要求人民连环互保；实行连坐法，在捕获真盗以后，即行依法处理，地方逐步安定下来。

那时诸暨地方，流行着捏造罪名，进行诬陷的风气，待到官府代为申理，受害的已经家破人亡，无可挽回了。

在子龙到任的初期，一次乡间人击鼓鸣冤。他痛哭流涕地说起儿子被邻居杀了。

杀人是一件重大案件，子龙当然要立刻处理。他问是那一天谋杀的？

“是昨天。”

“怎样杀死的？”

“用铁椎打碎脑袋的。”

“你家里离县城多远？”

“四十里。”

子龙立即吩咐备马，前往验尸，奇怪的是苦主再三提出，道路艰险，不敢劳驾，这就益发引起子龙的怀疑。可是他坚持要去。衙役们打着灯笼火把，子龙跨马，连夜前进，果然是一具男尸，他是苦主的儿子，但是因痲痹病死的，已经好几天了。经过审讯，这才理解到两方本来是冤家，恰好这家的孩子死了，因此把杀人的罪名架到对方，那时重则监禁，可以趁此报复；轻则和解，也可以得到赔偿。不料子龙连夜赶到现场，作出适当的处理。

诸暨是有银矿的，矿场就有好几十处。万历年间，曾有内监到此开山，后来封闭了。矿场的周围，便成为游民麇集的所在，这时已经聚集到数千人。子龙为了预防变乱起见，一边对于头头进行法办，一边却对群众进行疏散。正在推进的当中，一位武官手持巡抚熊奋渭的指令，大意说是饥民无所得食，只能由他们进行淘沙，一边解决衣食的问题，一边也可为国库增加一定的收入。他最后指明“事或可行，仰该县条陈利害，即日上报。”子龙仔细一看，指令是确实的，关防也符合，可是事件还不尽可信，因此一边吩咐属员热忱款待，一边具文上报，探询是否属实。及至巡抚衙门正式公文下达，这才知道指令是捏造的，什么“救济饥民，增加收入”也是虚伪的。这才把那位冒官诈骗的犯人，依法处理。

崇祯十四年的正月，子龙到杭州贺节，回诸暨的时候，正值大雪封途，山路皆断。子龙驰车直前，一路看到饥民千百为群，肩上背着米袋，手执长刀。

子龙停下车，问道：“你们准备怎样？”

百姓认识是陈知县，可是他们并不骇怕，只说：“粮食没有了，店铺也不开市，只有到大户家里分粮。”

子龙对他们进行劝解。他和他们说这样做是犯法的，可是生活正在威胁着他们。死亡就在眼前的时候，人民是不考虑犯法不犯法的问题的。在这个情况之下，子龙赶快到诸暨县，一边把为首的乱民处分，一边下令把四郊的义仓全部打开，按照米价七折出售。

那时还是十七世纪的前期，子龙和人民的认识水平，都受到时代的限制。土地是私有的，土地上产生的粮食也是私有的。减价出糶是按照什么价值呢？按照生产成本减折吧，那时对于粮食的生产成本还没有估计的依据；按照当时的出售价格减折吧，那么在奸商哄抬价格以后，即使按照七折出卖，还是于囤折粮食的地主有利。从我们今日的认识看，无论子龙有怎样的好心肠，他还是站在地主立场上考虑问题。作为地主，他必然也拥护地主的利益。处分乱民，固然意味着血腥镇压；七折出售，依然维护着地主的固定利益。当然，这是从今天的认识考虑问题，子龙的认识不可能超越他的时代。要拿我们此时此地的认识衡量子龙的言行，那很可能走上时代错误的道路。

子龙初到诸暨的时候，他估计到丰收以后，必然会出现灾荒。他和当地人民讨论，认为藏在公家容易发生损失，不如藏在民间。最后确定由地主们量力储备，待到粮价暴涨以后，减价出卖。万一遇到天幸，没有缺粮的现象，那时由地主们自行出售，县官不加限制。经过这次的商谈，各乡储备的粮食，统共一万多石。崇祯十四年的正月，子龙亲自到地主家商量，其结果是有些富户把粮价压低十分之三，开仓出售；有些捐出粮食十分之三，开设粥厂，进行施粥，这些都由县内的举人、秀才们出面主持。子龙又提出几千两的公款由商人到外县购粮出售，所得利益，一半给与商人，一半举办人民的公益。

诸暨的情况安定下来，但是灾荒正向诸暨的邻县发展。浙江省的长官因此把诸暨的经验，再向邻县推广，子龙也就由诸暨调向

四围，主持救灾的工作。子龙这就著了草鞋，手持竹杖，踏遍浙东的各县。人民由于生活的艰苦，由灾情的蔓延转变成成为病情的蔓延，子龙创办病坊，由名医对于人民进行治疗，这就是现代的公立医院。人民生活艰苦，因此孩子们更苦了，子龙创办了育婴堂，待孩子们成长以后，由其父母或他人领回抚养。据子龙的估计，在这一年的灾荒中，用米七万五千石，活人十余万；病坊施药一万余剂，救活一千余人；育婴堂救活弃婴三百余名。

子龙的本职工作是绍兴府推官。这是现代司法官的工作，现代分为审判和检察，处理民事和刑事审讯的工作，旧时代是不分的。既然是官，当然就有官的身分，经常是威灵显赫，与从森严，老百姓看到，都感到毛骨悚然。子龙是官，但是他还没有忘去自己是从人民中出身的。可能他还记得江南的一位老名士归有光做官时的态度吧。有光在处理诉讼案件的时候，有时竟把原告、被告喊到面前，和颜悦色地和他们叙述家常。他是昆山人，在长兴做官，这两地都属于吴语区域，在方言上本来没有太大的区别，可是由于他反复唠叨，因此他的絮语出了名，成为一时的话柄。子龙也曾经叙述自己的经过：

……越李历数人，大约欲以风裁见，不无稍自倨重。与从多光丽，掾史与台因以耀小民，见者恒惴惴。予性既坦易，少威仪，不立章程，小民可以不时见，讼狱以数言决，每以善言解谕之，使各悔过以去。苟非大过，鞭扑之声，竟月不闻也。又不轻拘摄，虎冠者眈眈无所事，终日假寐，或荷锄去耳。出则禁舆殿，前导不过五人。时游山泽，与诸生高论清言，人不知为官长也。惟奸吏、刁奴之戕民者，逆子、傲弟、妒妇之败伦捍化者，虽豪中大家，必破柱求之，穷治乃已；朔望集耆夫、三老，讲圣谕六言，则令其人跪听，必宗党邻里保其改过始释。吴越邻壤，饔飧之需半给于家，官厨萧然，门多鸟雀，民颇信之，故时行度外事，开隙权势，卒不能夺众论也。

在绍兴推官任内，子龙虽然署理过诸暨县知县，不过这是偶然的，他的大部分时间，还是在绍兴度过。旧时代的官衙，一般都是

比较宽大的，除了审案的大堂以外，有书房（清代称为签押房），有内宅。行政官还有幕友（清代称为师爷）办公和自己寄宿的住房。推官只是知府的属官，可是同样也有内宅和书房。崇祯十六年，子龙的学生王沄曾经到过绍兴，在子龙衙内住过数月，留下一篇《越游记》，因此我们对于子龙当时的生活，可以了解一些。

绍兴知府的公署在城内卧龙山之下，推官衙门在其西，称为宛委斋。子龙到任以后，在斋前建立清音堂，堂额是黄道周用八分书题的。抱柱是一副对联，上联“爱物若鹇虞”，下联“指佞如屈轶”，也是道周写的。清音堂一排五间，子龙住在上首，王沄到了，在下首住下。满屋都是书籍，由于推官的公事不多，因此子龙清早起身，很快就把公事处理完毕，这就回到清音堂，开卷读书，依然是书生本色。在他读到高兴的时候，他就把王沄喊过来，两人共读。有时需要检书的时候，他经常吩咐王沄去检。子龙说是某书某卷，很少有错误的。

子龙有时也要著作诗文，他经常是端坐凝神，一些声音也没有。间或徘徊一下，随即下笔疾书。那时他就高喊一声，王沄随即过来，他们同时朗诵，总得把这一篇作品仔细玩味一下。有时子龙对王沄说：

“来呀，这一次你代我拟一篇。”

王沄当然不敢轻易接受，可是子龙还得让他下笔。在诗文定稿以后，他对王沄著实称道一下。

这时，绍兴府的一位刘宗周罢官家居，这是当时的大臣，和黄道周齐名的。崇祯十四年建州的军队对于明朝发动又一次的进攻，思宗临朝而叹，当时宗周任左都御史，他提出几项主张：（一）表扬死守畿南的总督卢象升，（二）追戮误国的大臣杨嗣昌，（三）逮捕不服调遣的悍将左良玉。其次他请思宗要做几件事：（一）防守山海关以备反攻，（二）防守潞州以备李自成的透渡，（三）防守通州、天津、临清、德州以备南下。特别是最后一条，因为当时从长远利

益考虑问题的人，认为北方已经成为国外、国内双重进攻的目标，附近的山东、山西、河南随时受到威慑，京城既然无形地成为孤岛，不如向南京撤退，以江南、闽浙、湖广等比较完善的区域，作为后方，形成负隅之势，可以随时出击，保证中央的安全。

宗周毅然地说：“十五年来，皇上处分未当，造成今日的败局。不追求祸根，改弦易辙，要以一切苟且的政策，补救现今的缺漏，不是长治久安之道。”

思宗的脸色变了，可还是忍耐着。他问道：“已往的无从追悔了，现在要考虑善后之道。”

“善后之道”，宗周继续说：“要请求皇上开诚布公，以好恶公诸天下，以人才问诸国人，进贤才，开言路，次第与天下更始。”

“目下烽火直逼北京，国家败坏已极，那应当怎样办？”

宗周说：“武备必先练兵，练兵必先选将，选将必先择总督和巡抚，择督、抚必先择吏、兵二部尚书、侍郎。宋人说过：‘文官不要钱，武官不惜死，则天下太平。’这两句话在今天还有深刻的意义。一般的言论，只论才望，不问操守，可是没有操守不谨而遇事敢前，军士畏威者。若徒以议论便捷，举动恢张，称曰才望，取爵位则有余，论事功则不足，于成败没有什么作用。”

思宗又说：“事变之中，先才后守。”

“前人败坏，皆由贪纵使然，所以从济变言，更应当先守后才。”

“大将别有才局，不是仅凭操守可以成功的。”思宗说。

宗周接下又说：“他不具论，即如范志完从辽东总督进为督师，担负着对建州作战的重任，可是操守不谨，大帅偏将，无不以贿进，所以三军解体。由此看来，还是操守为主。”

说到这里，思宗的颜色转得平和了，只是说：“知道了。”

宗周因为给事中姜埰、行人熊开元以建言下锦衣卫狱，他提出“二臣以建言获罪。本朝没有言官下狱的，有之自二人始。皇上度

量卓越，狂妄如臣宗周，戇直如臣黄道周，蒙皇上之恩，不加贬斥；可是二人不幸，不蒙法外之恩。”

思宗说：“道周有学有守，非二人可比。”

“是的，二臣诚不及道周，但是朝廷待言官有体，言可用用之，不可用当置之。即有应得之罪，亦当付法司。今遽下诏狱，终于国体有伤。”

宗周的言论，直接触犯了思宗。思宗怒声道：“法司、锦衣卫，同样是刑官，何公何私！还有，对于一二言官，加以处分，何至遽伤国体。有如贪赃枉法，欺君罔上，都可以不问吗？”

“锦衣卫都是膏粱子弟，”宗周说，“听内监门指使，懂得什么礼义！皇上对于贪赃枉法，欺君罔上，同样也应当交给法司处分的。”

思宗蓄怒已久，现在再也忍耐不下去了，大声说：“刘宗周这样地偏执，怎样当得起左都御史之职，着即革职拿办。”

皇上的震怒是无法挽回的，可是道周的声望，在当时是众心所归，怎么办呢？内阁大臣在思宗面前再三解救，最后给与革职为民的处分。

崇祯十六年，宗周回到山阴，进行讲学。明代是一个讲学盛行的时代。所谓讲学，都是讲的立身处世之道，和我们这个时代所说的讲学是不一样的。刘宗周回到山阴故乡，由于乡里故旧的进见，他和他们讲了些做人的道理，以后在大戢山立证人书院，称为戢山书院。黄宗羲《明儒学案》卷六十二有《戢山学案》，这里录取宗周语录一条：

古人济大事，全靠脚跟定，只是不从身家名位起念，便是。凡可夺处皆是此等作祟也。诚极则精，精极则变，一切作用皆从此出。诚中之识见是大识见，诚中之担当是大担当。故君子非有才之难而诚之难。

这实在是见之言。明代末年，黄道周、刘宗周确实已经做到有胆有识，忧国如家的地步。他们为了国家的前途，献出了自己的生命，这是道学家的两面光辉的旗帜。子龙受教于黄道周；到了山

阴，又从宗周讲学的当中，亲受教益，这就必然把他的思想意识，大大地推进了一步。

坚持斗争，永远斗争

南京的君臣溃退了，是不是还可以支持一下，划江为界，南北分治呢？中国自古就没有这样的故事。三国时期，曹丕的大军和东吴有过南北分治的形势，但是当时的战场主要是现今的皖北。南北朝时代，经历晋、宋、齐、梁、陈五个阶段，也始终没有划江为界的事实。也许我们可以提到南唐中主时期割让江北十四州这个阶段，但是那是南唐亡国的前夕，是最后喘息的一刹那，其实是不足为例的。

战事在发展中，南京的统治终于崩溃，弘光帝的政权结束了。南京的人民把监禁中的王之明解放出来，要他支持危局。这一位自称为崇禎太子的人来了，他称“孤卧薪尝胆之身，赖尔臣民拥戴入宫，皇天庇祐之灵，托太祖高皇帝不泯之功德，守兹神器，保此丰镐，非敢有贪天之心也。愿尔臣民念祖宗之先业，先帝之苦心，各竭忠心，保全大物，下亦可以自安身家，庶见忠义尚存草野，城池固而百姓安，余心慰矣。”当然，这只是一幕插曲。前后三日，他为清军所获，最后和弘光帝一同解往北京，被杀。

划江为界，是一件不可能的事。那吗明太祖初起的时候，仅仅保有南京一隅，淮扬一带主要为张士诚所有，为什么太祖终于讨平群雄统一中国呢？当然，在一个朝代初起的时候，他有朝气，有击破强敌，统一国家的意志，因此终于击破张士诚、陈友谅，最后征服群雄，建立强大的帝国，可是这样的朝气，到了十七世纪四十年代已经不存在了，无论弘光帝、王之明，以及后来的隆武帝、永历帝都不再能成为强大的号召力量，南京政权的死灰，不能复燃了。

当时的长江南岸，充满着各式各样的矛盾。

首先应当注意的是地主豪绅和一般人民之间的矛盾。当时的

长江南岸的地主豪绅拥有大量的土地，同时由于他们掌握着政治势力，常常能把应由大地主负担的完粮纳税的任务和其他形形色色的劳役转嫁给贫苦农民，待到贫苦农民无法负担以后，他们往往把自己的土地甚至本身的自由献给大地主，成为投靠的佃农和奴隶，这就形成长江以南最严重的两极分化，一边是对于国家不负担或极少负担义务的地主，一边是丧失自由和保留极少自由的贫雇农和农奴。长江以南的形况特别严重，所以明代后期的大学士徐阶称其乡为鬼国，见于张居正的书牒中者历历可考。地主和贫雇农、农奴之间，是极少共同语言的，因此明代后期长江以南随时会发生暴动的可能。董其昌的家乡就发生过一次人民火烧其昌住宅的大暴动。在严重矛盾出现的当中，要求把地主豪绅和贫雇农联系起来，为一个共同目标而奋斗，是几于无法实现的愿望。当然，当时的贫雇农和农奴也是反对外来民族的侵略的，但是如何组织地主豪绅和贫雇农农奴为一个共同目标而奋斗，不是一件简单的任务。

在地主豪绅的当中不是没有矛盾的。这件事在表面上谁都没有提出来，但是作为暗流，这是具体存在的。法国在十九世纪中叶，议会中除了主张资产阶级的民主党派以外，还有主张君权的，这又分为两派——包本王朝和波拿巴皇朝。包本王朝之中又有大宗和小宗两派。由派系主持政局，必然会不断地引起纷歧。明朝从燕王朱棣破南京，夺取政权以后，部分群众还是拥护被剥夺政权的建文帝，因此无形之中有拥护当权的朝廷的，也有拥护被剥夺政权的建文帝一系的。这一切在表面不易看到，但是作为暗流是确实存在的，特别由于建文帝时首都原在南京，所以江南人民对他更有感情。

弘光帝失败了，他作为俘虏被清政权南下的军队解往北京，终于献出了自己的生命，王之明做过南京城内的三天皇帝，也同时被杀了。清政权的军队正在组织从南京出发的侵略势力。明代的残